

新世纪欧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东北叙事”

戴瑶琴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系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在欧美新移民小说中,除一定规模化的“上海叙事”和“温州叙事”之外,中国东北也成为有特色的文学存在。东北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被书写、开发和再造。创作者从土地和人两个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国东北的地缘风貌。新世纪以来的欧美新移民小说除延续将“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作为基本的艺术维度和美学构思之外,还强化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野性、自由、包容度和生命力。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东北叙事;新世纪

中图分类号: I206.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5)01-0014-07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1.003

当“南方想像”跟随着苏童、格非、叶兆言、王安忆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唯美的文学风景之时,“东北风骨”以粗犷热烈的生命激情和质朴淳厚的地方风致挑战“江南美学”。

地域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寻根文学”的旗帜罗致了大批以“地域”命名和界定的小说,也启发文学研究者、人类学研究者开展对地域文化的相关研究。卢卡奇说“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不管人们对它可能采取何种态度,一种关于人和事的总体才是可能的。”^{[1] (P135)}一篇《文学的根》振奋着一批始终坚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创作者投入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中,“东北”并未成为“寻根”的主流,文坛留下了梁晓声、张抗抗的“知青文学”牵动学界对“东北”的一次次关注。马原、洪峰、迟子建、孙慧芬持续为当代书写东北故事的彪悍遒劲和东北文化的苍凉辽远。

若追溯至现代文学,“东北作家群”是东北地域经典小说的创造者,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等用他们的作品记录、追忆和繁衍“东北文化”。对“沦陷区”草根百姓蓬勃生命力的彰显是“东北叙事”的突出标志,将“东北故事”留在中国现代小说

史中。同时,“东北作家群”对风土人情的积极展示也使得“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成为“东北叙事”基本的艺术维度和美学构思。这样的“自然形态和人生形态,宜于远视、俯视而难于近视”^{[2] (P16)}。由东北特殊的乡土文化孕育的文学想像在总体上呈现出空间化、场面化的特征。大兴安岭的原始生态,辽阔苍茫的居住环境,狩猎伐木、淘金采参的生活形式等,通过语言建构出粗犷豪迈的气质和豁达潇洒的风貌,读者同时感受到天地的博大浩瀚和人心的自在自由。

海外华人文学保有对东北的文学关注。在台湾文学中出现过的“东北叙事”是创作者以回忆或想象为线索,将自己经历过的东北生活进行文学再现。梅济民、潘人木、司马桑敦、赵淑侠等都创作过带有寻根色彩的作品。1949年,“迁台”的东北籍作家思考着日本、俄罗斯文化对中国东北的影响。同时,他们当下的台湾生活与之前的东北经验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与互证。在欧美新移民小说中,除一定规模化的“上海叙事”和“温州叙事”之外,中国东北也成为有特色的文学存在。东北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被书写、开发和再造。创作者从土地和人两个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国东北的地缘风貌。“文化

收稿日期:2014-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美国华语电影研究论(2000—2015)”(12YJC760010);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籍欧美新移民作家作品研究”(L09DZX016)。

作者简介:戴瑶琴(1979-),女,江苏丹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台港暨海外华人文学、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不仅是我們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感情、关系、记忆、亲情、地位、共同体、情感满足、智力享受、一种终极意义感,所有这些都比人权宪章或贸易协定离我们大多数人更近。”^{[3] [P131]}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东北文化是“由具有中原汉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东洋’和‘西洋’文化、前苏联文化、共和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文化、沿海发达地区的‘特区文化’、移民文化等等多元文化丛组成的文化体”^{[4] [P10]}。因此,新移民作家的“东北叙事”主要源自“过去”,与当下真实的东北生活存在一定的“遮蔽”和“误读”。

在实践“东北叙事”的海外华人作家中,有东北籍的作家,如哈金、曾晓文、黄雨欣,有非东北籍作家,如程抱一、严歌苓、山飒。他们对“东北”都提供自己的文学理解:依然延续“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的传统叙事;将“东北”仅仅作为一个独特的叙事背景,赋予故事神秘感和可读性;对东北人的个性特质进行重新审视。无论哪一种处理方式,创作者都试图表达自己理解的真实东北,虽然在某些作品中,这种个体认知并不是十分精准和客观的。

新世纪欧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东北叙事”可以从三个向度拓展。首先,它注重对“东北之力”的勾勒和阐释。从本质上来看,它继承了“东北作家群”对地域生命力的张扬和对“胡子文化”的突显,洋溢着一种“侠武之气”。其次,它注重对“东北之地”的描绘与理解。它与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东北的审美是基本一致的。乡村、草原、匪窝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自然与巫礼互相渗透,烘托出东北的文化诗意和人文品质。最后,它注重对“东北之民”的性格挖掘与人格重塑。新移民小说以现代汉语的表达张力承载西方的人文关怀,为东北人这一独特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解。

一 东北之“力”

“东北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是出现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创作者开启了对东北之“力”的赞美,即人永不屈服的品质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东北之“力”也因此成为“东北叙事”的基本文化元素,贯穿在几乎所有的“东北叙事”文本中。“东北作家群”把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炽热的民族情感、北国的血泪,还有不屈的剑与火,凝聚于笔端,写出了既富有东北地域色彩又质

朴粗犷,甚至充满野性力量的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重要创获”^{[5] [P139]}。

东北之“力”有两层文化含义。

一是生命力

“东北作家群”对生命力的歌颂是其明确的创作宗旨。萧军、萧红、端木蕻良,他们用文字雕刻出在乱世中坚强生存的人物,通过他们表达出生命不息的人生理念。萧红笔下的二里半、王婆、金枝都是在近乎野蛮的“非人”环境下求存的人,萧红说再这样下去“天地也不容”。鲁迅评论《生死场》,曾提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然而,在一潭死水中的平民虽然对自己野兽般的生活状况没有准确认知,可依然存有对未来美好的期待。赵三参加“反加租”“镰刀会”;二里半死守“财富”,喜欢过节;妇女们常聚在一起唠家常。人不是在等待死亡,而是怂恿着悸动的乡村,暗中建立起新的秩序。卢卡奇论及托尔斯泰小说时说“在十分罕有的伟大瞬间——大多是死亡的时刻,有一种现实向人展示出来,在这种现实中,人以透视一切的突然性看到并把握住关于他、同时支配他的本质,即他生活的意义。在这种体验面前,全部过往生活都陷入虚无之中,他的所有冲突和痛苦及其所造成的全部烦恼和错误,都显得狭隘,又非本质。意义显现出来了,进入生气勃勃生活的道路向心灵敞开着。”^{[1] [P137]}端木蕻良笔下记录着“坟场是死的城廓”,而“蛙鸣振碎人人的寂寞;蚊虫骚扰着不能停息”。在“东北作家群”扎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一个又一个十年见证着生死的村庄,不断在重新认识和理解生死。静止与运动的参照预示着终将来临的希望。

新移民作家对东北“生命力”的表达依然传承“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理念。哈金笔下的人物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依然散发旺盛的生命力与执着的求生意志。但与“东北作家群”的作品相比,他的小说对生命力的呈现不再从“存活”的危机中铺展开来,因为生存的意义不是因为人渴望“活”,而是要求“活”得有质量。从记录中国故事到反思移民生活,虽然哈金的创作思路发生了转变,但是他并未舍弃对根植于东北人集体意志中的执着、坚强、执拗的强调。应该说,在《自由生活》之前,哈金的小说是完全跳脱开异国图景,扎根进中国东北农村(大连金县和黑龙江佳木斯),凭借其稳健的叙事、深刻的悲悯来探索中国平民的精神困境。

“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东北是惨痛与惨烈的,无

论是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是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民族苦难、人性悲歌缠绕进十年不变的生死轮回。法国华裔作家山飒的《围棋少女》也曾成功地以抗战时期的东北为创作背景,通过一种别致的古典浪漫承载中日关系复杂性的话题,但与萧红的“东北”相比较,思想力度与深度仍未超越。哈金的创作素材来自他所熟知的生活,没有脱离他的思想之基和生活之源来重新构建一片天地。中国东北地区先天的生命热力和乐观因子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而它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批判。因此,哈金小说对威胁生命之力的精神之痛的成因分析就具有了三重内涵:主体性格的恭顺与懦弱、乡土陈规的干涉与禁锢、革命集体的严密与强大。

新世纪海外华人小说中对“新移民”的塑造,有一个母题,就是展示“新移民”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型。而在这个“生根”的过程,就如同严歌苓所说,是把自己从中国“连根拔起”栽种到一个新的国度。生命力的昭示就在这痛苦的移植过程之中。《自由生活》将一名普通留学生在美国“落地”的故事,以十分平实的语言进行文学重构。小说主人公武男拥有最寻常化的海外留学经历:留学生、餐馆打工、养妻育子,他不得不一次次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选择。与生存最紧密相关的元素是追求和忍耐。小说中武男和他的妻子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在守护这两个“元素”时产生复杂的心理交战。

从总体上来看,与中国现当代小说相比,欧美新移民作家对生命力的表达具有更加突出的自我意志,一切行为是从个人利益角度驱动。

二是野性

东北的“胡子文化”对“东北叙事”影响颇深,因而作品常常涌动着一股粗犷的蛮性。胡子(关内称土匪)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现象。钱穆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时,曾将其分为城市、乡村、山林、江湖等四种类型。对于江湖文化,他曾说过中国主要是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其静态下一动态。江湖文化被赋予了神秘、边缘、多元、自由的特色。因此,以“匪”“盗”“绿林”等形象出现的江湖人物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创作资源,可追溯至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

霍布斯鲍姆曾定义的“土匪”若从法律上来讲,就是任何一群以暴力从事抢劫和袭击活动的人。由于东北土匪构成来源的多样化以及落草为寇动机的多元化,从而使东北土匪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和

性质,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创作空间。

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等小说的价值在于追随历史的变动来刻画东北社会的现实图景,其中直接或间接地以土匪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占相当比重,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遥远的风沙》、舒群的《誓言》。

萧军作品的“野性”体现在语言个性上。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浓烈的乡风民俗。“小说中的反抗者,不论他们最初的身份是农民、苦工、胡子、旧军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有东北的‘胡子气’。”^{[5] (P141)}李欧梵曾准确地用“土匪”来概括萧军小说的精神线索,并把“土匪”命名为第一“主题词”。他阐述萧军后来参军,也可以说是延续他成为武林英雄的人生抱负。所谓的“土匪精神”,是他的人生特征;到他后来弃武从文,这又成为他文学作品的特征。

而在欧美新移民作家的笔下,对“野性”的诉求和表达不仅渲染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蛮性”,而且张扬原生态自然文化所显现的勃勃生机。“野性”是民间在对抗严酷环境时被激发出的自然反映。

加拿大女作家曾晓文的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东北人和东北故事,但是因为曾晓文是出生和成长在黑龙江,她将文化根性中的“血性”和“豁达”投射在创作中,赋予人物强势的生存态度。《梦断得克萨斯》通过嘉雯99天的美国“炼狱”,叙述女性浴火重生的经历。中国东北是嘉雯的精神皈依。在监狱里,她梦见“一辆火车远远地驶过来,火车散发出的黑烟让冰城夏日的天空变得阴郁了。小嘉雯经常站在家乡冰城的小火车站里看火车,火车可以把她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而她是多么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6] (P344)}。出狱后回国探亲,“当火车完全停了下来,她走下火车,双脚终于踏到了故乡的黑土地。她庆幸自己在带着脚镣走过了得克萨斯南部小城昏暗的监狱之后,又感受到了故乡土地的厚实和温暖,找回了意志和力量的源泉”^{[6] (P470)}。与其他新移民小说不同,这部自传性作品记录的是由女性来承载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特别是在美国监狱,嘉雯屡次冲破苦难封锁都是依赖自己的意志和血性。“美国梦”与“阶下囚”瞬间逆转,小说通过两种极端局面的并置,烘托嘉雯的坚强和坚韧,她在寄居、囚禁、漂泊中,比男性更为果敢。嘉雯表达了“东北

人”在接受与承受苦难时对生命的理解。“生活教会了她坚强,她以自己的坚强为骄傲,但是现在她才明白,人仅仅坚强还是不够的,还要柔韧,柔韧的性格才不会轻易被折断。”^{[6] [P17]}这种“柔韧”是一辈子扎根在东北的“朱小环”^①们始终无法掌握的,可却是“多鹤”^②们与生俱来的。

二 东北之“地”

从“东北作家群”开始,“风景画”和“风俗画”一直是“东北叙事”的个体标签。创作者既开发东北独特的地域景观,又刻画独具东北个性的传统风俗。“正是在东北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中,那种渔牧围猎、马上征伐、勇闯关东、拼搏求生等生命行为和意识交相融合,蒸腾凝聚为一种包含了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积淀、具有原始洪荒色彩的东北精神。”^{[7] [P87]}而东北之“地”最核心的文化内涵是作家对土地的感情。

东北土地辽阔肥沃,自然环境瑰奇雄美。民族繁衍、日俄之争、军阀割据,历史影响了东北地区的格局。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等对东北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形态的表现,萧红对东北人民生存状态的描写,都打造出个性化的乡村。

在现代文学中,“乡土”又被赋予思想层面的所指。东北的乡土文学解说着时代主题和民族需求:“一是国难与乡愁的交融;二是民风乡俗的剖判同国民品格剔挖的结合;三是美学品味的追求同高扬民族精神的统一。”^{[8] [P107]}“东北叙事”从现代流转进当代,未舍弃社会批判性特质。例如洪峰在小说《瀚海》中批评东北缺乏诗意和生机。他认为,如果说中原文化凝聚那块贫瘠土地上的人们,使人们在那里付出生命和血汗可以赞美,那么在东北,人是在消磨生命。

同样秉持着“批判”,“东北作家群”是“怀着厚爱深情来诉说着对故乡土地的依恋热爱,来诗意传神地描绘着黑土地的广袤与伟美。由于有背井离乡的流亡背景和“乡愁”的“酵母”,更使他们对故乡土地的依恋与热爱具有了极为强烈浓厚的感情色彩”^{[7] [P74]}。端木蕻良在《科尔沁草原》中描绘草原“天气是火烧云的天气,……地气开饭锅似的向上翻,震荡的,波动的,千万条没有火光的火舌,在关东的沃野上有节奏有音色地跳跃。十里外的小村子,都巧妙地剪贴在水玻璃线铺就的天色里,在太阳

光里浮耀。”^{[9] [P31]}他还在《大地的海·后记》中指出自己写的都是一些关于土壤的故事,而人类的文化则是开辟了土地以后的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东北作家群”强调的“东北之美”可以被认为是在传达一种“土地崇拜”。萧红和端木蕻良两位作家都着迷于对特殊人物风貌的叙写,而这其中备受争议的莫过于对萨满教活动的叙述。单从文本来讲,每一次以诅咒或祈求为目的的“跳大神”,最终升华为一场观(群众)与演(巫师)之间的狂欢。

欧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东北”不再铺展开壮阔浩瀚的景物描写,而是专注于能透视东北文化的“乡村”细节。《小姨多鹤》关于自然只是几笔勾勒,但非常有特色。严歌苓透过抗战胜利后逃亡中的日本遗孤的眼睛来记录创伤中的东北大地所经历的惨烈和伤痛“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的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10] [P5]}而与之对照的是1948年国共战争时中国平民眼里的战后东北“麦秸垛看不出什么变化,宽阔的田地很静,完全不是刚刚做过战场的样子。一大片麻雀落下,啄了一阵落在地里的麦粒又一大片飞起。打仗的时候麻雀们不知去了哪里。田野在这时显得特别大,远处什么景物都像是搁置在天地之间。一颗歪脖子槐树,一个草人,一个半塌的庵棚,都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坐标点。”^{[10] [P31]}两重视角、两种表达、两个族裔都是借土地的力量,诉说东北之殇。

哈金以日常生活的白描来展现东北乡村民俗,进而折射东北人的集体性格。《等待》描写了一次东北的“集市”：“中街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商贩。他们卖鸡鸭、蔬菜、水果、鸡蛋、活鱼、猪崽、衣服。到处是柳条筐、鸡笼、油罐子、鱼盆和水桶。一个卖哨子的秃顶男人在吹哨子,哨音划破空气,刺痛人们的耳膜。西瓜摊前的几个姑娘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大声吆喝着,一边用鹅毛扇轰着苍蝇。”^{[11] [P7]}他通过简单的“物”与“人”组合的普通生活场景,还原东北的文化生态。

欧美新移民小说很少渲染东北自然景观的美

①②朱小环与多鹤都是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中的人物。

感。“风景画”和“风情画”已不再是作家渴望描绘的地域之美,但是创作者未放弃对风俗的文学再现。“风俗”的内涵丰富,关涉多个文化层面,有乡村都市。“风俗”的内容庞杂,有婚丧嫁娶农耕渔猎。应该说,新移民小说对风俗的表达是有一定倾向性的。原因是创作者还在选择自己熟悉的东北过往生活,呈现“彼时”的文化状态,不得已舍弃了对“此时”的重新挖掘。同时,创作者在面向西方受众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他们的审美期待和阅读兴趣。因此,东北“风俗画”的描绘难免会有一些的概念性和先验性。

三 东北之民

东北人是“东北叙事”的对象,是东北故事的亲历者。创作者通过对东北普通人的关注和重塑,描画自己心中的东北全貌,进而表达个人对东北文化的理解。

“萧红总是借地域风情的描绘和乡土中国的记忆,揭示人性的丑陋,鞭挞人的愚昧,质疑生命的存在,不断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也在生命寂寞的底色上绘就自己的‘田园牧歌’。”^{[5] [P143]} 她的《生死场》对东北土地最准确而凝重的提炼是“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12] [P408]}

与男性人物相呼应,“东北作家群”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发散着浓烈的地域气质和地域个性。女性的悲剧在于女性被迫遵循男权话语之下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萧红小说中的女性之所以悲惨,首先源于她们失去了工具性,如月英、怀孕期间的金枝、私自嫁给冯歪嘴子的王大姑娘,她们的人生悲剧是由异性和同性共同制造。王大姑娘经历了一场集体残杀。杨老太太和周三奶奶在王大姑娘出事之后,以礼法为规范,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宣示立场、捍卫纲常。她们强化了关于王大姑娘的谣言,当得知她被迫上吊时,更是拖儿带女地充当看客。萧红既痛恨同类残杀,又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做过帮凶。

《小姨多鹤》中的朱小环是严歌苓汲取东北人典型性格的基本元素而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乐观、坚强,但又泼辣和鲁莽。“吵架”是小说烘托朱小环人物形象的关键细节。她的怨气来自没有生育能力,可偏偏却必须充当张俭和多鹤的三个孩子的“亲娘”,并在人前维护和维持多鹤小姨的虚假身份。与温柔精致的多鹤相比较,朱小环火爆粗俗。她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家庭,完全是出于爱丈夫和孩

子,才同意他们去日本,而并非是大度地成全多鹤和张俭的爱情。她一直是用“不怎么高贵的中国乡村语言”教训儿子张铁:“你是没丢脸,那是你想丢丢不掉。当时要真能把你那张日本脸丢了,你肯定丢!你是丢不了啊,所以你用把剃刀把两道日本眉毛、日本鬓角、日本胸毛给剔下来,丢厕所下水道里!对着镜子,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把你亲妈给你的这张脸给丢掉。”^{[10] [P269]} 可张铁一句“不是亲妈,才会记仇”就将朱小环的心抵上了刀尖。但无论她和张铁如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朱小环还是把他送回了多鹤身边。当所有亲人都离开,只有狗陪伴的时候,朱小环再也不吵架了。“她意识到这一生吵吵闹闹多半是为了家里人,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周围的人和事她都马马虎虎对待,找不着什么事值得她吵。她连说话都说得马马虎虎,因为马虎的话黑子也不马虎着听,照样听得无比认真,以它生满白内障的眼睛瞪着她。”^{[10] [P273]} 粗犷的外在与柔软的内心形成了一种戏剧性的反差,朱小环特别生动地展示出东北女性的传统美德与传统缺陷。

哈金的小说以“等待”为母题,通过探索东北人的精神世界,揭示东北人性格中的纯朴、正直和些许愚昧。《等待》与《战废品》聚焦中国东北和朝鲜,讲述着普通人“等待”的原因、“等待”的过程和“等待”的结果。平凡人因追求自由而历经的现实摧残和精神折磨是小说《等待》最精彩的一笔。孔林需要的爱情自由与他被提供的爱情自由形成了激烈冲撞。孔林身上兼有传统和现代两种思想的互相角力,更有乡土习俗对他的严密管制,因此他不敢彻底挣脱家庭的罗网。同时,旧式女性和新式女性也并陈在小说之中。孔林是淑玉和曼娜各自痛苦的直接肇事者,但两个女人对孔林的把持也造成了她俩长期的互相折磨。哈金“相信习俗和男性中心主义都对中国妇女的不幸福有责任。但妇女也具有双重性,这意味着某些女性也是压迫者,也在制造其他妇女的苦难史”^[13]。

《战废品》中的中国战俘也同样沉陷在“等待”的炼狱。小说虽然细腻地描写了志愿军战俘所遭受的种种非人道的身体摧残,但心灵痛苦才是真正盘桓他们终生的梦魇。俞元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回到四川,与未婚妻一起奉养母亲。因此,从成为战俘的那天起,他就坚定地等待被遣返大陆。伴随着“等待”,他被挤压在国共两党之间,成为时代的弃儿、政治的牺牲品。小说集中刻画了俞元“等待”的过程,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两次身份“甄别”。在

这个“归属”抉择过程中,他经历了最严酷的灵魂拷问。无论逼迫还是诱惑,他都不放弃回到大陆的信念。与《等待》一样,哈金似乎钟情于安排宿命的轮回和未来的不可知,像俞元一样被遣返大陆的战俘,他们穷尽心力等来的“回归”其实早已偷偷酝酿着一场政治风暴。小说的思想深层探究了信仰问题。信仰与战俘们一生的精神之痛紧密相关。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哈金通过两个层次消解了信仰。俞元首先向西方基督教求助,可事实证明,宗教在战争面前并不承担纯粹的灵魂救赎,它也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俞元选择亲近共产主义,可他无法完全放弃自我去服从组织。显赫的革命领袖如裴山、朴先生都无法逃脱被抛弃的厄运,最终是无党派无信仰的俞元成为遣返大陆人员中最幸福的人。正因为战争的历练帮助他摆脱对信仰的依附,进而夯实了回归家庭的信念。

在新世纪欧美新移民小说中,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是一个特殊的“东北叙事”文本,作者对东北人的塑造开发了全新思路。严歌苓本人与东北并无关系,但是《小姨多鹤》鲜明地以中国东北为叙事背景。故事跨越几十年,讲述着东北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传奇经历。严歌苓对“东北之民”的最大创造体现在丰富了对“东北人”的概念界定。小说主人公“多鹤”的真实身份是日籍的东北人,这一双重背景尤其在东北故事里越发具有特殊性,它为在东北尤为敏感的“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解读,并对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因此小说的人物设计与其他的东北叙事小说相比较,更有新意和弹性。

需要指出的是,新移民作品对“东北之民”的界定还有更多指涉,既包括生活在东北的人,又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东北人。对于后者,作家并未有意强调过笔下人物的“东北”身份,这些小说人物却因为共同的地域血缘和相似的文化根性而集合在了一起,成为在欧美对中国东北的代言人。

四 余论

新移民作家对“东北叙事”的写作彰显对现实主义的热爱,立足从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但他们对典型环境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倾向性:政治性最突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中国。创作者首先必须考虑如何将“文革”叙事不落入控诉与流泪的俗套,同时对其他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开发也很值得探索。《小姨多鹤》塑造了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苟

且偷生的日本“二战”遗孤竹内多鹤。多鹤与中国多重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说的重点,也是小说的看点。严歌苓设置的典型环境时间段为20世纪40—80年代;陈列的典型环境是日本战败、中国东北、反右、“文革”、中日邦交正常化、改革开放;塑造的典型人物是在中国东北生活的日本遗孤。“历次中国政治运动”与“日本遗孤”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碰撞出了颇有新意并暗含极强戏剧性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小说的吸引力就在两个典型不断地互相冲击中弥散开来。歌德说过,一切高尚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是深沉的,好像是在睡觉一样,是矛盾把它唤醒,并向它挑战。具有特殊身份的日本遗孤在特殊时期的非凡遭际,刺激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与思考的冲动。

海外华人作家对“中国东北”的描绘既值得期待又需要研究。“东北籍”的作家凭借自己海内外的生存经验和人生阅历为“东北叙事”注入活力,“非东北籍”的作家也在积极表达对东北的独特认知,两者的文学创造共同提升“东北叙事”的文学影响力。与大陆当代作家相比,欧美新移民作家中“东北籍”的作家无意将传统意义上的怀乡恋土的“乡愁”情绪倾注于笔端,他们笔下的“东北”更具有复杂的个人心绪与乡土情结。王德威说“原乡的渴望来自作者(与读者)个人离乡背井后的感情投射。但如沈从文等的作家明白,因之而生的乡愁除了是真情流露外,也代表了文学传统的溯源寻根,更暗示了文学写作‘望乡’姿态的搬演。故乡之成为故乡,必须透露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象魅力。当作家津津乐道家乡可歌可泣的人事时,其所贯注的不只是斯土斯人的写实心愿,更是一种今非昔比的异乡情调。”^{[14] [P112]}“原乡的诱惑其实源于离乡甚或无乡的惶惑。”^{[14] [P110]}海外华人作家是以隔岸观照的姿态表达着他们对故土的一种现代想像,尽管这种想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时空的远隔而有所失真。任何小说创作都无法穷尽真实生活的复杂、残酷和荒诞,在新世纪新移民小说中,“东北”的文化意义还是比较单一的。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 小说理论[M]. 燕宏远,李怀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2] 弗雷泽. 金枝[M]. 徐育新,等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 [3] 特瑞·伊格尔顿. 文化的观念[M]. 方杰,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韩春燕. 风景颗粒——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小说解读 [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5] 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6] 曾晓文. 白日飘行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7] 逢增玉. 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8] 高翔.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 [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9] 端木蕻良. 科尔沁旗草原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0] 严歌苓. 小姨多鹤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1] 哈金. 等待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12]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6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3] 哈金. 幸福也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权利 [EB/OL]. 新浪网, <http://book.sina.com.cn/news/a/2005-04-22/0926183725.shtml> 2005-04-22.

[14] 王德威. 当代小说二十家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Northeast Narrative in Overseas Chinese New Immigrant Novel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DAI Yao - q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new immigrant novels ,nar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has its unique feature even if compared to the “narration of Shanghai” or “narration of Wenzhou” which has been well known. It focuses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gional customs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Northeast China ,and usually also mixes the innovation and renovation. The authors propagate the regional customs and landform from two aspects i. e. ,land and people. The overseas Chinese new immigrant novel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not only inherit the artistic dimension and the aesthetic ideas of the social customs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local ethnic flavor ,but also further emphasize the wild power ,freedom ,tolerance and vitality of Northeast people and their local cultures.

Key words: new immigrant novels; nar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the new century

(栏目主持人 李洪华; 责任编辑 胡海金)